

# 戈壁滩上马兰花

——记高邮籍中国工程院院士乔登江

□ 乔国平

神秘马兰，根扎处、沙滩戈壁。茎粗壮、笔直挺立，秉性刚烈。花艳芬芳招众喜，叶兰新巧如玉碧。玉骨残、甘愿化成泥，谁能匹。

乔院士，真豪杰。罗布泊，死神敌。隐名埋姓氏、子离妻别。铸盾砺矛强军梦，终身许愿建功业。育英才、热血写春秋，情殷切。

——《满江红》代题记

2015年5月8日22时45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就是“两弹一星功臣”、核物理学家、核技术应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乔登江。

乔登江的襁褓之地在高邮菱塘回族乡乔大庄。1928年3月，乔登江出生在这里的一个世代农民家庭。他共有兄弟姊妹十人，但只存活了他和大哥乔登山、妹妹乔登玉。

乔登江父母是贫困农民，后因生活所迫，流落到南京城，在那里开了一家“手工作坊”。乔登江童年时当过学徒，到了上学年龄，母亲便把他送到南京珠江路小学读书。

1937年，日本鬼子侵占了南京。为躲避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和大屠杀，父母亲眼含泪水，离开了辛辛苦苦经营多年的小作坊，重新回菱塘老家乔大庄。逃难途中，他们遇到了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慌乱中，九岁的乔登江右眼被伤，加上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永远失去了光明。

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只有国家强大了，人民才会不被蹂躏。从那时起，他就立下了振兴中华的志愿。

在老家，他们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待形势稍有好转时，举家又去了南京。在南京珠江路小学继续上学期间，他参加了“童子军”。

1944年，乔登江小学毕业后，考取了南京第五中学。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面的扩大，他的兴趣也越来越广泛。放学后，他常去书场听说文，每次听得都很入迷。为此，他没少挨父亲的打。家人认为他是个调皮的孩子，可少年乔登江一直做着富国强民之梦，寻找着改变穷苦人命运的道路。后来他背着家人，私下参加了地下党组织活动。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坏”孩子，故意抽烟、打架等。他常常利用一处卖香烟的小店，掩护地下革命工作。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后，南京城里经常是汽笛长鸣，鸡犬不宁，一片白色恐怖。见怪不怪的市民都知道：一旦警车出动，国民党军警、特务就开始抓人了。一天，事发突然，组织上来不及通知一位女地下党员转移，就把这个情报交给了“坏孩子”乔登江。乔登江急中生智，巧妙周旋，躲过敌人的重重关卡，终于把这个情报及时地送给了这位女同志。这位地下党员由于及时得到了情报，躲过了一劫。她，就是解放后一直在教育部任职的曹婉同志。

1948年2月，乔登江凭借着聪明的才智和顽强的意志力，读完了中学。后来，又考取了南京金陵大学物理系。进入大学后，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下，他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1949年3月，南京解放前夕，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中共正式党员。

1952年，金陵大学毕业后，乔登江留校任物理系助教老师。1955年，乔登江被组织派往北师大进修理论物理，跟随苏联专家苏式金和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教授学习高等数学、理论物理和统计物理。在张宗燧教授的指导下，乔登江整天如饥似渴地吮吸知识于理论物理的百花丛中。经过两年系统的学习，他学到很多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理论，为他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7年，他以优异的学业成绩从北师大毕业。后来，组织上分配他到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任助教，讲授理论物理。因才华出众、工作勤恳，他很快被提拔为物理系副主任和系党总支副书记。

1963年3月，一张神秘的调令从北京发来，要求36岁的乔登江即刻到北京报到。

在北京工作还是到其他什么地方？干什么？多长时间？一概不知！就连找他谈话的书记、校长也不知道内情。

此时，乔登江从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四年的妻子林祖饕刚刚回国，一岁半的孩子正蹒跚学步；自己的事业才有了一点起色。面对学校的挽留，亲友的劝阻，妻子的泪眼和刚刚学会叫爸爸的儿子的一声声稚嫩的呼唤，他有点于心不忍。

就在他犹豫之时，眼前浮现出了孩提时逃难时的情景和后来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画面。

“去！”他终于拿定了主意，直觉告诉他：党在召唤，肯定是去干一件大事！

于是，他告别了情有独钟的高等教育事业，告别了生养自己且已年迈的父母，告别了聚少离多的妻子和刚会叫“爸爸”的宝贝儿子，到北京报到了。后来，他成了24位赴罗布泊，为建设新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并参与首次核试验准备的专家之一。由此，他和他的战友们踏上了科学救国的征途。

茫茫戈壁滩，粗砂、砾石遍地都是，动物都难觅踪迹。除了一些麻黄、沙拐枣等耐旱植物外，偶尔可见一两朵色彩斑斓的马兰花，为茫茫戈壁滩增添了些许生机。

乔登江没有军人先天性的强壮体格，却有着军人天生的精神气质。他用他特有的军人气质，书写了他的第一个传奇：36岁的年龄，一只眼睛，参加了解放军，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茫茫戈壁，千里无人。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出门就要跑。每天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他对自己的战友们说：“这是壮国威、壮军威的‘惊天动地’的事业，为此吃点是值得的。”

戈壁风尤其是夜风，人们时常受到它的侵扰。一天吃早饭时，人们发现乔登江的嘴巴被风吹歪了，而且是越看越歪，大家都很吃惊，但乔登江却泰然处之。后来虽然进行了治疗，但还是留下了面瘫后遗症。面对歪着的嘴巴，他说：“就当作为我国核试验做出的又一牺牲和贡献吧。”“安下心，扎下根，戈壁滩上献青春”，这几句简单且直白的话语，道出了他和最早从事核武研究人员的共同心声。

中国第一任“核司令”张蕴玉将军称乔登江：“创业不畏难，科技称典范”。有一次空中试验，参试人员已进入待命状态，但由于气象条件发生了变化，不能确保试验区的安全。这种情况下，试验还要不要正常进行？这在试验委员会中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乔登江站在全局的高度，用计算数据说明了试验可能造成的危害，说服了领导，推迟了试验，确保了此次试验的安全。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一朵蘑菇云在茫茫的戈壁滩上腾空而起。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震惊了全世界，也震撼和激励着亿万炎黄子孙。原子弹爆炸时，乔登江担任着理论预测组长，负责爆炸安全以及爆炸后的数据处理。

1966年10月，他参加了导弹试验，并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两弹的结合。第二次核试验后，他与张超、程开甲、吕敏等9人，作为我国核试验研究所的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1967年6月，他又与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一起，参加了第一颗氢弹试验，分享了爆炸成功的喜悦。

自此，乔登江参加了所有的第一次核试验。正当事业蓬勃兴起之时，十年浩劫开始了。乔登江和他的战友们也未能躲过这一劫。他虽未受皮肉之苦，但遭到抄家和无休止的思想检查和批判。

1969年，年过40岁的乔登江被下放到工兵团当兵锻炼，与连队晚一辈战士一起，在试验场区干起了修公路、架桥梁的重体力活儿。此外，他还得干刨土、种菜、挖地窖、做木工、孵小鸡等杂活。但他相信，乌云终究挡不住太阳！

“天生我材必有用”。1970年8月，乔登江被抽调参加军事科学院组织的全军核武器防护教材编写工作。从此，他与理论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我国参加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之一，来之不易的实践只有上升为理论，才能成为传承后世的“真经”。

乔登江主持编写的《核爆炸效应参数手册》，成为全军核参试部门指导核武器防护和核效应试验的重要依据。他主持编写的《战略目标核效应手册》，弥补了我国核试验中有关毁伤规律和效应方面的缺项，被总参批准为核作战部门制定火力计划的工具书。除此之外，他还亲自主编了国内该领域至今唯一的一部巨著《核爆炸物理概论》。该书是指导从事核试验与核爆炸技术人员的经典参考书。

离休后，乔登江仍笔耕不止。“我要把一辈子在科学道路上探索出来的东西写出来，传下去，这是对国家的贡献。”他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为此，他为自己订了每天至少写3000字的写作计划。

“爸，您生过大病，眼睛又不好，可要注意身体呀。”儿子心疼地对他说。

乔登江说：“我在世的时间不多了，不尽快把东西写出来，将来去见马克思，心也不安啊。”

后来，他又相继主编了《电子元器件电磁脉冲效应手册》《脉冲束辐照材料动力学》等五部著作。

根据我国20多次地下核试验爆炸现象规律，在参考了国外大量信息后，他与韩学安、李如松合作，主编了《地下核爆炸现象学概论》；与吕敏院士等专家合作，编著了《核爆炸与核试验》。

中科院资深院士吕敏教授这样评价乔登江：理论上突破是技术上公关的前提，在基地这个“龙头”位置上，乔登江在一些领域起着关键作用。

乔登江硬是靠着一只眼睛，凭借坚强的信念，凭着非凡的意志力，参加了所有的“第一次”核试验；完成了五部学术著作，留下了270万字的“真经”，为后人提供了一大笔极其宝贵的核武科研经，书写了他人生的第二个传奇。

1988年5月，60岁那年，乔登江在部队例行检查时，被查出右肾有恶性肿瘤。基地领导和医院专家力劝他抓紧时间去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手术。这样的病情倘若发生在别人身上，可能早已精神崩溃。

此时的乔登江，虽然也有点懵和忧虑，但军人的天性使他很快冷静了下来。

他镇静地问医生：“我最多还能活多长时间？”“开刀不能再推几个月？”



医生说：“你必须尽快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做切除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我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试验要做，手术能不能推迟？哪怕是一星期？”乔登江请求着。

“不行！”医生斩钉截铁。

面对死神的威胁，一个人竟能如此的镇定，还在思考着自己钟爱的事业，谋划着具体的工作，这是多么高尚的品质，多么崇高的境界，多么坚强的意志！

在部队领导和战友们的强烈要求和劝说下，乔登江把所有的工作交代完了之后，才去了北京，住进了301医院。此时已是发现病情之后的一个月零八天了。

即使到了北京，住进了医院，乔登江还时刻惦念着工作。在准备手术的那几天，医院附近的炮兵招待所正在开一个抗辐射加固学术会。一天下午，他偷偷从医院溜到会场，了解会议的研讨情况。第二天，他又起了个大早，第一个出现在会议室的门口。老战友们见此情景，热泪盈眶。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

上了手术台后，乔登江问医生：“几个月可以工作？”他对身边的人说：“我不求长生，但求不虚此生。”

手术很成功，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1988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恢复我军军衔制，全军上下一片欢腾。文件规定：副军级且60岁的不再授衔，一刀切没有余地。而此时的乔登江刚满60岁。这对乔院士来说，是多大的遗憾啊！早在1965年以前，乔院士就扛过大尉肩章。20年后，论资历和级别当个将军条件绰绰有余。但他毫无怨言。

不仅如此，组织上叫他离职休养，就连顾问工作也未被批准。这对一个在戈壁滩上工作了几十年，把工作视为第一生命的乔登江来说，是多难的难受！大家也为他感到不平。可他初心不忘，不埋怨、不发牢骚。

著名科学家阿基米德说：假如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那么支撑起生命的支点到底是什么呢？是工作，是坚持不懈的工作。

术后，乔登江躺在病床上真的流泪了。因为他失去了生命的支点——他酷爱的工作。

他的妻子林祖饕是一位研究硅酸盐材料的专家，此时的她最能体会到丈夫的痛苦：一辈子，只见老乔流过一次泪。

1988年10月，宣布离休命令，他还躺在病床上。他的流泪，不是因为病，也不是因为没有授衔，而是因为他失去了工作的机会。他的妻子记得，曾有一次，乔登江在西安研究所完成技术攻关项目后，又飞往张家界参加学术讨论会。连续的奔波，过度的疲劳，让他头昏呕吐，高烧不让，情况十分危急。望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很少得到他关心的两个儿子趴在他的床头哭了。“爸，您留点时间给我们吧，不要再干下去了。”

他第一次以父亲慈爱的手握着儿子的手说：“爸有工作干是件好事。如果不是这些支撑着，爸早走了。”当年，他被授予“胜利荣誉勋章”。在一只肾被摘除后，乔登江离休后转到了地方工作。

“退休未敢忘忧国，白头唯有赤心存。”离开其心爱的工

作，他非常不习惯。

他一边吃药、锻炼，一边继续关心专业组的各项技术工作。每当所里邀请他参加技术研究活动时，他总是非常的乐意。

他虽然脱下了军装，但他心系部队，还担任了全军专业组、电子部专业组顾问。

（下转三版）